



西汉兴亡在于民生

曲柄睿

西汉的灭亡与王莽改制

西汉自元帝以后，逐渐走了下坡路。整个西汉的基层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一方面，自然灾害频仍，粮食歉收，越来越多的百姓走上流亡就食的道路。另一方面，官员和商人通过土地兼并，成为大庄园主。经济上，他们广占山泽，役使依附民为他们劳动；政治上，他们染指地方治权，干涉司法审判。史书上将这批人称为“豪右”或“豪强”。豪强势力的扩大，削弱了西汉政权的统治基础。

将目光投向西汉朝廷，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一方面，汉成帝以后，接连三位皇帝没有子嗣，史称“国统三绝”，汉朝遇到了继承人危机。另一方面，汉成帝任用王氏外戚，使政权旁落，养虎贻患。

如此严重的天灾人祸，汉家天子打算如何应对呢？他们既没有选贤任能打击豪强，也没有乾纲独断疏远外戚，他们选择听从儒生的建议，通过改制来换取天意的支持。具体来说，当时的儒生鼓吹这样一套宇宙观：天与人相感应；王朝的建立源自某种特殊的天命；王朝面临的危机，都是天命衰微所致，必须再次获得天命，才能克复危机，再造盛世。

很明显，这套理论是喊人的假把戏。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却被人们奉为圭臬。

汉哀帝将年号改为“太初元将”；改自己的尊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这个古怪称号与王莽不无关联。王莽自称乃舜之后人，祖上是陈姓。“陈圣刘”就是“王胜刘”之意。改元与改尊号，自然不能解决汉朝的实际困难，更不可能再造汉家盛世，只能浪费解决复杂社会矛盾的时间。

汉哀帝死后，王莽立了年仅9岁的汉平帝。5年后，平帝早死，王莽又选择了一个年幼的刘姓宗室为帝，史称“孺子婴”。王莽以代理皇帝的身份自居，不仅将朝政大权揽在手中，更是在宫室、舆服等方面比拟至尊。他要取代汉朝，只差一个契机。

很快，契机来了。

有一个叫哀章的无行浮浪子弟，伪作了两条所谓天帝除书。一条内容是“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条是“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这第二条简册大有门道。在汉代流行的天命理论中，刘邦建立的西汉，属火德。《汉书》中记载刘邦斩白蛇起义，神秘的老妪称刘邦“赤帝子”，是其明证。那么哀章简册中的“赤帝”，很明显就是刘邦了。又根据天命理论，火德之汉终将为一个得土德的王朝所取代，那么“黄帝”一说，自然指的是得土德的天选者了。这个天选者不是别人，正是王莽。理由就是王莽是舜的后代，而刘邦是尧的后代。尧舜禅让，就是土德取代火德的历史范本。今天，舜的后代，理所应当代替尧的后代，占有天命。

哀章所上简册，被视作上天要求改朝换代的命令。王莽如获至宝，郑重地跑到

刘邦的宗庙里拜受天命。然后他下达诏书，正式宣布即天子之位，改国号为“新”。可笑的是，哀章伪作的简册，为了凑够人数，胡乱编造了两个名字。王莽还真派人找到了他们，分别是故城门令史王兴和卖饼的王盛。王莽将他们二人，由布衣拔擢为卿相，以显示符命的准确。

在天下人的瞩目下，王莽终于开始社会改革。这是人们盼望已久并对王莽寄予厚望之处，不过王莽很快就让天下人大失所望。他一味地按照经典所载进行改革，很多措施施行不便。王莽又朝令夕改，更让吏民手足无措。西汉中期以后积累的社会矛盾，并没有因为换了国号和皇帝就自然消解。百姓的生活非但没有随着天命的改换好起来，而是更加糟糕下去。日益醒来的民众意识到，要改变命运，还得靠自己。

刘秀的反莽事业与再造一统

王莽统治末年，天下接连发生自然灾害，百姓迫于饥寒，不得不离开家乡，就食他郡，演化成大规模的流民潮，与新莽政权发生冲突。开始，流民们仍以就食为目的，不敢与官府直接对抗。王莽对他们一味采取高压强硬态度，无意解决具体的生活困难，终于激起流民们更大的反抗。

山东地区的反莽势力逐渐合流，形成了高度组织化的赤眉军。长江中游的反莽势力结成了绿林军，他们与南阳的刘姓宗室势力结合，成为起义队伍的急先锋。刘伯升、刘秀兄弟，就是南阳宗室的代表人物。

《后汉书》记载，刘秀是刘邦的九世孙。他九岁丧父，由叔父抚养成人。据说刘秀为人谨厚，好稼穡之事，本不欲带头起义。当天下寇盗蜂起之时，刘秀判断兄长刘伯升一向轻侠好士，必然会参与反莽活动，方才在李通的建议下，组织宾客，拉起造反的大旗。

事实上，史书中关于刘秀情形的记载远不止此。《后汉书·酷吏列传》记录了东汉建立以后，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评价他在乡里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所谓刘秀“谨厚”云云，其实反映了史家对胜利者的美化。真实的刘秀，应该是一个城府颇深的人物。这一特点，在刘秀建国的历程上反复出现。

刘秀兄弟起兵后，在昆阳大破王莽军四十二万人，打出了起义军的威风，使王莽政权一蹶不振。

但是，起义军的分化也在此时发生了。被起义军共同推举为皇帝的刘玄，因为猜忌刘秀兄弟，阴谋将刘伯升杀害。刘秀忍辱负重，神色如常，并没有表示出丝毫不满。终于，刘秀获得刘玄的信任，被派往河北地区，镇慰州郡。

刘秀抵达河北不过两个月，当地的刘姓宗室拥立卜者王郎为天子，定都邯郸。王郎政权将更始政权的代表刘秀视作眼中钉，对其不断追杀。刘秀在信都太守任光等人的支持下，利用乌桓突骑，击败了王郎政权。

至此，刘秀在河北站稳了脚跟，并与更始政权分庭抗礼，准备一统全国的事业。

割据河北之后，刘秀派遣邓禹率军过黄河直逼长安；另派吴汉起兵进发洛阳，正式开始灭亡更始政权的军事行动。建武元年（25）十月，镇守洛阳的更始将领朱鲔投降刘秀，东汉政权定都洛阳。此前，赤眉军已经击败更始政权，占领了长安。赤眉政权与东汉政权的对抗，成为当时政局上的主要矛盾。

赤眉政权没有摆脱流寇习气，诸将每日在殿上喧哗争功。三辅郡县慰劳军士，被赤眉将士抢掠一空。比较起来，赤眉政权还不如之前的更始政权更为正规。经过刘秀大将冯异苦战，赤眉政权力尽败降。

刘秀先后剿灭关东的刘永、董宪、张步等割据势力，又平定割据陇右和巴蜀的公孙述，重新完成了统一的局面。

统一之后，刘秀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鼓励恢复经济生产，增加劳动人口，也着重强调限制豪强，尝试缓和甚至解决西汉后期积累的社会问题。由此，东汉初的社会情况变得好转起来。

回顾西汉灭亡与东汉重归一统的历史，西汉后期的几位皇帝将王朝的命运系于茫然莫测的天意之上，继起的王莽更是将进步天意发挥至极。他们或改元更制，或醉心符命。对于百姓切实遭遇的灾害、饥馑、压迫，却没有像对天意那么敏感。也正因为如此，百姓抛弃了他们，转而选择了真正能够解决实际困难，改变生活处境的新的政权。



杨大志

历史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种十分常用的重要方法。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研究视角的多样性、研究者自身的倾向性以及历史本身的宏大性。因此，使用好历史研究方法、正确认识历史应具有三种态度。

充满敬畏之情

始终对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充满敬畏之情，既不作过度解读，又避免简单判断。

历史事件是发生在过去的社会现象。社会现象的成因是复杂多变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任何事态都不是单一原因的结果，也不会只产生单一结果。对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是以合力的形式发挥作用，而合力并不是纯自然的过程，而是各因素作用于行为体后产生的结果。由于行为体的行为始终受到观念因素的影响，因此社会活动中系统效应的运作机制与自然系统的运作机制是有本质不同的，是难以观察实证的。在使用历史研究方法时，对于单一因素作用机制的研究充其量只能得出或然性结论，即说明该因素对结果的相关性。而历史事件本身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充满敬畏，就是要清醒认识到自身研究和认知的局限，克制过度解读的冲动，避免简单判断的率性。

时空背景的巨大变化使得今人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容易发生偏移。这种偏移体现在研究者很难客观还原历史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因而也就无法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去理解历史事件演进的前因后果和内在逻辑。历史研究中资料和方法的片面性决定了历史事件研究的局限性。历史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研究历史文献、历史资料和个人回忆录等方式进行，还原展示历史事件，揭示历史规律。而历史文献、资料

和回忆录不可避免地带有著者自身鲜明的倾向性，同时，研究者在选取材料和解读文献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选择性，时间久远的历史文献可能还存在不完整、不全面的问题，这些都需要研究者保持清醒的认知。即便同一历史事件，由于当事人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不同，其记录和理解也是存在巨大差异、甚至相反的。

比如，解放战争中的苏中地区七次作战，在共产党方面称为“七战七捷”，而在国民党方面也认为达到了作战目的。原因就在于，双方的作战目标不同。共产党军队的作战目的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国民党的作战目的主要在于收复地盘，以占领城市，苏中七次作战，国民党方面虽然损失了一些部队，但最终收复了盐城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因而，在国民党看来他们也达到了作战目的。历史绝不只是事实的简单堆砌，历史的书写和阐发，取决于我们的角度、立场和追求的价值观。

抱有宽容之心

始终对历史人物的局限性抱有宽容之心，注重从社会背景和文化传承上剖析历史人物。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主要是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脉络上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前进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具体到历史事件中的关键人物，则对事件的发展走向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研究具体历史事件时，一定不能忽略关键人物对事件发展走向的决定性影响，同时也要避免对历史人物的过高期许，审慎认识历史人物的关键作用和自身局限。

评判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应是其是否顺应和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着眼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不要站在今人的立场上苛求或者溢美前

刻、更高尚的理念，工作质量和效果就不一样。我们要把民政工作当作一项崇高光荣的事业，带着一种情怀全身心投入其中，怀着“大爱之心、爱民之心”做好工作，为人民群众提供满腔热情、富有温度的服务，向民政战线的先进人物学习，把服务对象当亲人，让老百姓切身感受到民政工作者的真情热情。三是务求惠民之实。真正的为民不仅仅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更是为了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民政事业发展要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相协调，处理好正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关系，真正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全面推动新时代民政事业改革创新发展。新时代，必须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展中国家还在为国家力量的集聚而苦苦探求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经实现了有效领导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的跃升；赋予这套体制机制以强大的活力和韧性的，并非共产党自身，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党群关系的哲学理念与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的有效叠加，使得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执政有了最深刻的认同和最富有感情的投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力量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具有深刻政治意义的命运共同体，这是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奇迹的一把政治密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深刻地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等等，从更高层面进一步升华了党对以改革开放为主要驱动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通过提升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等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为中国改革开放顺利前行提供更稳健的政治关系形态，是新时代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人，更不要作简单的道德评判。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客观公正地评判历史人物似乎很难，特别是这种评价又带有某种政治倾向时，不公正不客观的现象便俯拾皆是，即便一些大历史学家亦不能免俗。以现今的认知状态评判前人，需要一颗有温度、有带入感的宽容之心。正如基辛格在其著作《世界秩序》中所言：“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而政治家必须在结果难料的情况下做出应对挑战的决策。”历史证明人的认识能力、预见能力和成功地自觉塑造基本事态的能力有时是相当有限的。

洞悉历史之势

始终对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怀有自觉之意，注重从历史逻辑和现实选择的统一中把握大势。

历史发展是自身逻辑与现实选择的统一，而不是理论预设的结果。“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对于历史发展，要怀有自觉之心，要有历史自觉性，要善于宏观思考，通过对大量具体事实（史实）的梳理，升华为对历史趋势的深切领悟，从自在的状态变成自为的行动，在历史趋势和现实选择的统一中把握大势。历史有可为之事，有不可为之事。不可为而为之，必然受到惩罚，带来灾难。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在发展模式上经历了艰难的探索，每一种发展模式的探索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每一种发展模式的艰辛都为今天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正是中国社会自身逻辑发展与现实生活理性务实选择的统一。

在历史逻辑和现实选择的统一中把握大势，要把视野放大，在细节与全局、过往与当下的贯通中审视。历史的全局是由若干历史的细节构成的，细节不清晰、不真实，

要为目标，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推动民政事业发展。一是立足全局谋划新时代民政工作。着眼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找准作用定位，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找准发展方位。紧密配合党和国家总体要求、总体规划，深刻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民政工作的机遇奠定了基础，正确认识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等国内经济社会形势变化对民生福祉的重要影响，积极探索新时代民政战略布局，统筹考虑未来愿景与现实能力、长远目标与近期工作，不断在服务全局中推动民政事业改革创新。二是转变民政政务服务供给方式。从供给侧发力，努力实现供给主体更加多元、受益范围更加广泛、惠民内容更加丰富、质

目标追求——正确处理自身发展与贡献世界的关系

不确证自身，便不足以贡献世界。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不仅是在自身历史比较中获得的，而且也是在世界维度的比较中获得的。生机勃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造福近14亿中国人民，而且昭示世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代表了人类未来的一个方向，应该有信心有能力不断迈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更高境界。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总结和吸收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及其他国家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形成了治国理政的一整套中国智慧。中国道路是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花结出的累累硕果。其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使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

全局就是海市蜃楼。沉溺于细节之中，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也不是正确的历史研究方法。当下是流动的过往，过往是凝固的当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社会现象也曾在历史中反复出现。用长远的眼光和广阔的视角，看待中国人民在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复兴梦想进程中正在经历和可能遇到的种种风雨，就能始终在喧嚣中保持一份清醒，在激荡中保持一份从容。今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40周年，在总结改革开放40周年历史经验时，应该把这段历史放在新中国成立近70年实践道路反复探索的视野中思考，把这段历史放在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110多年民族精英接续奋斗的视野中思考，还应该把这段历史放在世界范围内自二战结束以来70多年国际社会演进变迁的视野中思考。唯有如此，今天的历史经验总结才能更客观、更公平，更经得起时间检验。

在历史逻辑和现实选择的统一中把握大势，要努力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以史资政。即便是纯粹的历史学研究，研究清楚史实是基础、是目的，但也应该努力从史论中得出历史的教训和启示，更遑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历史研究方法，其使命更应该是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以史资政。今天，我们要牢记列宁在《论国家》中的教诲，他说：“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历史考察的目的不是对历史的重新展示，而是对于历史的分析和概括，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概括来探寻和把握历史背后的规律，以期得到启示和教益。



量水平更有保证。进一步筑牢兜底安全网，在提高保障力度的基础上不断增强民政救助的精准性和减贫效果。促进福利服务扩面、提质，逐步推动儿童福利服务惠及普通家庭，推进医养结合发展，不断提高老年人长期护理服务水平。增强民政管理服务效能，加快民政领域信息化、智能化发展。三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继续简政放权，能取消的主动取消，能下放的主动下放。积极创新监管，理顺放权事项监管机制。持续优化服务，为相关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参与民政事业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四是完善创新民政事业体制机制。推动健全党委和政府民政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加强跨部门的工作协调机制，善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作用，形成推动事业发展的合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既为全世界所分享，世界对于中国的认可也就最大程度强化了中国的自我认可。2008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以上，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获益者，更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者。除了在物质层面，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向全球贡献了和平的、文明的、发展的力量，为人类社会发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